

“书籍之路”与东亚武籍交流

蔡艺^{1,2}, 谭飞³, 唐群¹

(1.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福建 福州 350108; 3.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为探明中国武术古籍于何时经何途径传播至朝鲜和日本, 对东亚武籍再生产生何种影响, 实现怎样的交流等问题, 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等方法, 在呈现古代东亚“书籍之路”历史样态基础上, 对古代中国、朝鲜、日本的相关史料展以分析。研究认为:《纪效新书》《武备志》等绝大多数中国武术古籍由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书籍之路”, 集中在明清时期传播至朝鲜和日本。中国武术古籍东传异域之后, 通过原本再刊、摘抄部分内容成书、翻译与注解、以中国武籍为参考新编武籍等形式实现本土化再生, 从而助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东亚的广为传播。这些再生的域外武籍, 又有部分经由“书籍之路”回流中国, 形成循环往复的东亚武籍双向交流通道, 丰富了中国对域外武籍的历史认识, 为孕育具有同质性的东亚武术文化创造稳定的互动空间。基于“书籍之路”所呈现的东亚武籍交流史, 可以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向度, 从而彰显其在东亚的源头地位, 明晰中国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 武术史; 书籍之路; 武艺; 武籍; 东亚

中图分类号: G81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2)06-0031-06

The exchanges between “Book Road” and Wushu books of east Asia

CAI Yi^{1,2}, TAN Fei³, TANG Qun¹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2.Postdoctoral Working S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when and thought what channels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Wushu books spread to North Korea and Japan and to know what kind of impact on the reproduction of Wushu books in East Asia and what kind of communication were realiz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presenting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the “Book Road” in ancient East Asia,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in ancient China, Korea and Japan was analyzed. And the work is drawn: Mos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Wushu books, such as “Ji Xiao Xin Shu” and “Wu Bei Zhi” were introduced to North Korea and Jap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Book Road” among China, Korea and Japan. After those books were introduced to foreign countries, localized regeneration was realized through republication of originals, book forming with partial content extracts,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and Wushu book new editing referring on Chinese Wushu books, driving forward the wide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culture in East Asia. Some of these remade foreign Wushu books found their way back to China via the “Book Road”, forming a circular two-way exchange channel of east Asian Wushu books, which has enriched China'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ushu book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created a stable interaction space for breeding a homogenous east Asian Wushu culture.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Wushu exchanges presented in the “Book Road”,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culture can be viewed in a broader

收稿日期: 2022-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TY110)。

作者简介: 蔡艺(1979-), 男,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文史。E-mail: dulangcai@163.com

historical dimension so as to show its source status in east Asia and clarify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Keywords: the history of Wushu; Book Road; martial arts; Wushu books; East Asian

从历史角度审视,至少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真正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东亚的朝鲜、日本等^[1]。相邻的韩国、日本,“东亚史”抑或“东洋史”的研究已根基深厚且举足轻重,由此衍生的“东洋武艺史”亦备受关注。韩国的南钟旋^[2]、罗永一^[3]、金一英^[4],日本的黑木后弘^[5]、鱼住孝至^[6]等学者,均对东亚武艺展开过卓有建树的研究。“东亚”概念虽外延伸缩流变,其核心却凝聚于中华,我们要把握中国武术对外传播的历史脉络,呈现中国武术文化的全貌,就始终不能回避“东亚”的存在。书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在中国武术文化熏陶下,形成以书籍为媒介的武艺交流。将东亚武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明晰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与影响,还能彰显中国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拓展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汉字是东亚地区许多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超越语言的文字符号^[7]。汉字通用引发汉籍在东亚的传播与繁荣,中国文化以书籍为载体,在东亚地区开辟出循环往复、纵横交错,撒播华夏文明种子的“书籍之路”。王勇^[8]将东亚文化交流的“书籍之路”与连贯东西的“丝绸之路”进行比较,认为“丝绸”与“书籍”的关系类似于米粒和稻种,“大米”西运贵在解决温饱,促进繁荣;“稻种”东传则能生根发芽,孕育精神世界的绿洲。

千百年来,沿“书籍之路”流播东亚乃至全球的中国汉籍浩如烟海,其中亦包含数量可观的武籍。通过东亚各国间构建的“书籍之路”,大量武术书籍从中国传播到东亚,衍生出新的武籍,从而不断丰富东亚武艺的内涵与外延。与此同时,部分武籍又从域外回流至中国,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构筑以中国武术文化为母体,别具特色的东亚武艺文化。

1 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

武术古籍是指记载武术内容的古代典籍。早在汉代,我国就出现专门的武艺书籍。遗憾的是,“汉魏以前的武术图书基本没有传存下来,宋元以前的武术古籍,只有少量射箭图书幸存焉,其他兵械武术图书基本上一无了遗”^[9]。随着印刷业不断发展和对武学的愈加重视,明清时期武术书籍渐为丰富,“是古代武术创编出版最为丰盛的时期”^[10]。据学者考证,中国武术

古籍总数约40余种,明清时期36种,占据绝大部分。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中国武术古籍在东亚地区传播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

1.1 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明清之前,鲜有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半岛的记载。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的契机出现在16世纪末期爆发的万历援朝战争。经过7年战争洗礼艰难获胜的中朝两国,均认为朝鲜兵力羸弱、军事防御落后是战事初期日本势如破竹的主要原因。为此,明王朝吸取朝鲜“不独苦倭之扰,兼苦我兵”^[11]的教训,在援朝过程中对其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其中就包括军队操练和武艺技法的传授。平壤战役(1593年)后不久,朝鲜国王宣祖问及明军前后胜败之异,李如松答曰:“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12]宣祖听闻之后如获至宝,旋即“密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纪效新书》的东传让朝鲜认识到了学习中国先进军事理念及武艺技法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打开便利之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经总要》《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古籍于万历援朝战争前后陆续东传,为朝鲜武籍的编撰奠定基础。

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明朝与建州女真再起纷争,连绵战事阻断朝鲜的朝贡路线,加上皇太极两征朝鲜,使得原本畅通的“书籍之路”举步维艰。明清易代之初,朝鲜主张反清复明的“北伐论”此起彼伏,清王朝对朝鲜亦心存戒备。受此影响,类属兵书的中国武术古籍东传绝非易事。17世纪末期,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郑氏政权的覆没,清王朝进入“康乾盛世”。朝鲜在“北伐”无望的情势下,对清朝态度转向强调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北学”。在英祖、正祖右文政策的影响下,朝鲜文化再现欣荣景象,英祖甚至在奎章阁专门设立五品军职的检书官,负责蒐集、检校书籍等事宜,原本断绝的中朝“书籍之路”恢复畅通,中国武术古籍也迎来新的传播热潮。东传朝鲜半岛的中国武术古籍中,既有《武备志》《武编》《阵纪》等兵书,亦有《涌幢小品》《三才图会》等笔记与民用类书,还有《少林棍法禅宗》《内家拳法》等专门的武艺书籍。

1.2 中国武术古籍在日本的传播

如前所述,中国武术古籍大多成书于明清时期,

故其在日本的传播与朝鲜相似,于16世纪之后较多。然而,中日关系自嘉靖倭乱(1555年)开始恶化,后又经历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年)。在此期间,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日本受限。17世纪后,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德川幕府为禁止天主教传播,实施严厉的闭关政策,严禁日本人出海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直至1636年才做出补充规定,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停驻长崎港。因此,中国武术古籍在日本的传播大多在此之后。江户时代中日海贸恢复之后(1636年),两国的民间贸易日趋兴盛,书籍则是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13]。关于江户时代两国的书籍贸易,清商朱柳桥在文政九年(1826年)正月与日本儒官野田希一的交谈中曾发表如下感叹:“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14]中日“书籍之路”的复通与繁盛,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日本创造了历史条件。

江户时代较早传入日本的中国武术古籍有《武编》和《武备志》。蓬左文库藏本的《武编》为明正天皇宽永四年(1627年)从中国购入。《武备志》于灵元天皇宽文四年(1664年)在日本首次刊印,说明在此之前就已传入日本。在崇祯年间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中,亦有关于《武备志》东传的记载,“我武爷最恶倭奴,尝欲命将出师动灭其国,倭奴遂咸服罪,进金叶表文投降,始赦其罪。然而海禁最严,今奸商嗜利,罔不畏死,竟以违禁等物至彼贩卖,深可痛恨。近日竟有以《大明一统志》及《武备志》渡海求利者,罪不容于死”^[15]。这则史料说明《武备志》当时被对外贸易所禁,虽然明廷海禁森严,但不法商人在利益驱使下仍以走私形式将其运往了日本。据郑振铎先生考证,《西湖二集》成书时间在1628年至1644年之间。由此可以推断,《武备志》很有可能在1644年之前就已传至日本。

由上可知,朝廷的严控并不能杜绝私贸禁书的行为。清代,这种汉籍输出稽查不严的松懈状况终未获得改观,清末藏书家缪荃孙^[16]曾言:“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颇用重价购书,江浙之间有司不甚稽查,所关匪细,应严伤官吏搜查海舶,毋许私贩。”这一方面说明江户时代两国商贸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对中国汉籍,特别是兵书极大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是日本了解明廷兵学状况的需要,更是其师中华长技,实现武备强军的需要。国家需要和良好的商贸基础相互交织,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清商朱柳桥“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之言,《唐荆川文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要略》《江南经略》《三才图会》《万宝全书》《少

林棍诀》等大部分中国武术古籍于江户时代通过海上贸易的形式传至日本,为其武道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2 域外武籍的再生

2.1 中国武术古籍的原本再刊

因东传异域的中国武术古籍数量有限,实现其在东亚的广为流播,“原本再刊”的添枝增叶至关重要。从史料看,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日本的原本再刊非常普遍。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朝鲜对《纪效新书》的推崇无以复加,为推广其练兵策略及操练之法,训练都监曾于宣祖37年(1604年)印行“江浙初本”和“移师闽中时后本”《纪效新书》^[17]。显宗5年(1664年),因“屡经变乱,散逸殆尽”,兵曹判书金佐明再次进献《纪效新书》,在朝鲜国王授意下“印出若干件,分送于三南各营镇,而以粧纒五件,上疏投进,以备睿览”^[18]。另一部中国武学巨著《武备志》在朝鲜亦有被刊印的记载,“命刊《武备志》五十卷于平安兵营,往岁使行觅来者也”^[19]。

和刻本中国武术古籍同样种类繁多。“日本在灵元天皇宽文四年(1664年),中野氏依照天启元年刻本刊印《武备志》,共二百四十卷,并《首》二卷,鹤饲石斋训点……到光格天皇宽政年间(1789—1800年),宽文本又有修订版,有大阪河内屋太助先生重印版、大阪河内屋喜卫重印版、大阪河内屋太右卫门重印版”^[20]。光格天皇宽政九年(1797年),刊印《纪效新书》十八卷并《首》一卷。此本由日人平山潜(兵库)校,其后有江户须原伊八两次重印本^[21]。孝明天皇弘化二年(1845年),大村五教馆刊印《纪效新书》十四卷,《首》一卷,并附《明史》列传。其后有弘化三年(1846年)江户和泉屋善兵卫重印本,又有文久三年(1863年)补刻本。这些域外再刊的中国武术古籍,推动了中国武术文化的域外传播,也为其他形式的武籍再生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参考。

2.2 摘抄中国武术古籍部分内容编撰成书

除原本再刊外,摘抄部分内容成书也是武籍再生的主要形式。《武备志》《纪效新书》等中国武术古籍大多卷帙浩繁,且武艺内容只为其一。为便于阅习,加上印制成本高等原因,通常会摘抄部分内容加以刊印。万历援朝战争时期,宣祖就曾言《纪效新书》“卷帙支繁,未易晓见”^[22],要求训练都监按束伍、阵法、器械等内容摘抄成册,亦有将棍、拳法等武艺内容单独成册的记载,“昨见唐兵结阵处,其一队皆持木棍。曾闻天朝之言,木棍之技,胜于长枪用剑云云。此技不可不习。且拳法,乃习勇之艺,若使小儿学此,则

闾巷儿童转相效则，习而为戏，他日不为无助。此两艺，儿童抄出，依前传习于李中军事，言于训练都监。仍以《纪效新书》中木棍、拳法两图付标而下曰：‘此法示于训练都监。’”^[23]

摘抄中国武籍部分内容成书的情况在日本同样存在。和刻本《删定纪效新书》存有多个版本，安原方斋就曾于嘉永七年(1854年)刊印过《删定纪效新书撮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刊本《唐荆川文集》东传日本后，于仁孝天皇文政元年(1818年)由京都河内屋藤四郎、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刊印成《唐顺之文萃》五卷，其后又有天宝八年(1837年)年大阪青木嵩山堂重印本。此外，日本曾于元禄十四年(1701年)刊行《兵法秘传书》，据传其作者为山本勘助(1493—1561年)，但日本学界认为该书可能系百余年之后托名的伪作。据绵谷雪考证：《兵法秘传书》图卷的人物姿态，是和西鹤本同样的师宣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是日本战国末期的著作。还有全棍(杖)和枪的用法是朝鲜风，可以确认此书是宽文7年(1667年)刊行的《武备志》抄本^[24]。

2.3 对中国武术古籍的翻译(译解)与注解

虽然明清时期汉字在朝鲜、日本的贵族阶层具有较高通识度，朝鲜也一直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但对繁冗深奥之文的理解难以透达深处，平民阶层阅读汉籍更是难上加难。《纪效新书》传入朝鲜之初，宣祖就曾感叹“予观天下书多矣，此书实难晓”^[12]。因此，通过翻译(译解)与注解形式对汉籍进行本土化推广，成为武籍再生的另一主要形式。壬辰倭乱爆发之初，朝鲜将《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整理成《杀手诸谱》。《杀手诸谱》成书后，为便于士兵阅习，宣祖又下令将其翻译成谚文(朝鲜文)，“岁在甲午春，特命训练都监翻译杀手诸谱”^[25]。在训练都监的努力下，《杀手诸谱》的翻译工作于次年完成，中朝文对照本的《杀手诸谱译解》得以刊行。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朝鲜还曾指派训练都监韩峤负责《纪效新书》的翻译、注解之事，力图实现“将领卒伍人人易晓”的愿景。

《武经七书》在东亚的传衍，是朝鲜、日本两国对中国武籍进行翻译、注解的典型案列。《武经七书》传入朝鲜后，成为武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世祖不仅下令刊印该书，还命申叔舟、崔恒等对《武经七书》进行注解^[26]。《武经七书》对日本兵学的影响同样深远，“夫兵书古今虽多，诸家说凡以《七书》为枢机”的理念深植日本兵学认知结构之中，使其自然认同《武经七书》作为中国古典兵学“核心”与“代表”的重要地位。作为这种认知观念的结果，整个江户时代对中国古典兵学的研究，绝大部分以《武经七书》为整

体对象而展开，从林罗山《武经七书译解》开始，《武经七书译义》《七书便义》《武经七书句解》《武经七书字义》《七书正义》等“七书类”翻译、注解的著述多达40余种。此外，据日本《国书总目录》记载，《纪效新书》的和刻本有《纪效新书抄解》《纪效新书定本》《纪效新书定本讲义》《纪效新书秘解》《纪效新书和解》《纪效新书图解》等，这些都是对《纪效新书》进行翻译与注解的衍生物。这些经过翻译(译解)、注解后的中国武术古籍，以通俗易懂为更多域外人士熟悉，扩大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东亚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2.4 以中国武籍为参考新编武籍

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之后，对朝鲜、日本的武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两国也开始根据自身理解与认识新编武籍的尝试，而中国武术古籍无疑是其模仿和沿袭的范轨。朝鲜先后编撰《武艺诸谱》《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武艺新谱》《武艺图谱通志》。《武艺诸谱》是朝鲜效仿浙兵操练规制，模仿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结果。《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是为完善防胡御倭的练兵教材，基于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万宝全书》所进行的创新。明亡清替之后的百余年间，《武备志》《少林棍法禅宗》《武编》《三才图会》等中国武术古籍相继东传，为《武艺新谱》与《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朝鲜汉文武籍的成书与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息息相关对此，集中、日、朝武艺之大成的《武艺图谱通志》^[27]指出：“戚继光《纪效新书》、茅元仪《武备志》俱为此书之表准。”承继关系可见一斑。

日本武籍编撰同样离不开中国武术古籍的滋养。“灵元天皇宽文三年(1663年)日本学者香西成资的《南海治乱记》，稍后荻笠徂徕的《铃录》，以及光格天皇天明六年(1786年)林子平的《海国兵谈》等，基本理论构想皆来自《武备志》”^[21]。灵元天皇宽文六年(1666年)，江户时代著名兵学家长沼潜斋刊出的重要著作《兵要录》，同样大量引用戚继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的理念和观点。日本学者松田隆智在其研究中指出，江户时代日本刊行的《军法兵法记》《兵法秘传书》《兵法奥义书》《武术早学》等武籍，均受到《纪效新书》《武备志》的影响^[28]。不难看出，无论朝鲜还是日本，其武籍编撰过程均汲取中国武术古籍的养料，保留着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基因。

3 域外武籍的回流

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日本之后，通过原本再刊、摘抄部分内容成书、翻译与注解、新编武籍等形式得到了再生，部分域外再生的武籍，又通过“书籍

之路”回流中国,实现东亚武籍“东传—再生—回传”的循环交流。

颇受国内学界关注的域外武籍回流案例是《武备志》中的“朝鲜势法”。关于“朝鲜势法”,《武备志》载:“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篇中有诀歌,不评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俱备。”^[29]时至今日,《武备志》所言“好事者”是谁,经由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仍无定论,但从《武备志》最早版本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以及朝鲜在壬辰倭乱之前“所传只有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27]的历史来看,“朝鲜势法”应出于1592—1621年。而在这一时期,朝鲜编撰的《武艺诸谱》(1598年)和《武艺诸谱翻译续集》(1610年)已经成书,虽然现有史料并无关于这两部朝鲜武籍回流中国的确切记载,但《武备志》已言明当时剑法在中国“其法不传”,由此可以推断,“朝鲜势法”必定与朝鲜再生武籍存有关联。

耐人寻味的是,这套“朝鲜势法”又衍化为朝鲜“本国剑”,出现在朝鲜显宗14年(1673年)的阅武活动中。当问及“本国剑”由来时,武臣柳赫然答曰:“臣见中国《武备志》有此刀,而称以朝鲜国刀云。”^[30]从16世纪末期《纪效新书》《练兵纪实》《武经总要》等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到朝鲜《武艺诸谱》《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等武籍的再生,到“朝鲜势法”回传中国,再到《武备志》复传朝鲜并衍生出“本国剑”,藉由武籍回流所产生的东亚武艺交流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已呈现勃勃生机。据黄建国^[31]对国内51个藏书机构的调查,国内所藏1910年以前的朝鲜古书籍共有2754部,90%以上是朝鲜版本,其中翻印的中国书籍为677部,古朝鲜文人著作为1254部,数量可观。这些回流的朝鲜书籍中也不乏武艺书籍,唐豪^[32]的《行健斋随笔》曾言及来青阁二十四年目录载有《御定武艺图谱通志》4卷并附谚解1卷,决意购买之时却被某图书馆购去。

日本武籍回流中国的现象同样存在。《武备志》作为明末武学巨作,因成书于抗击满清的朝代更替时期,书中一些表述为满清当权者所忌讳,所以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清廷列为禁毁书目,直到道光年间才得以再次刊印。自清初汪允文依据天启刻本翻刻《武备志》,到道光年间得以再刊的百余年间,日本宽文四年刊印的《武备志》又经“书籍之路”回传至中国。光绪年间丁仁编著的《八千卷楼书目》子部有“《武备志》二百四十卷,明茅元仪撰,日本刊本”^[33]的记载,可知八千卷楼所藏正是日本宽文本《武备志》。章炳麟^[34]言:“哀焚书第五”中读《违碍书籍目录》时见《武备

志》亦在其列,感叹道:“虽茅元仪《武备志》不免于火,后又用小字批注,《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书中勾勒《武备志》从清初被禁到清末弛禁的过程。而清末弛禁之后道光年间出现的湖南刻本《武备志》,就是以日本宽文四年刻本为底本所复刻的。“日本宽文年间刊印的《武备志》在清中晚期又回流中国,日刻本《武备志》基本保留了天启版《武备志》的原貌,对汉籍的留存具有一定的意义”^[20]。正是这部宽文四年和刻本《武备志》的回流,让《武备志》在经历禁毁之后依然能够重焕生机。除《武备志》外,弘化二年翻刻本十四卷《纪效新书》,弘化元年衡权堂刊印的《练兵实纪》等日本再生武籍也相继回流中国,成为中国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回流中国的域外武籍数量、种类虽难与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日本的传播相提并论,却是东亚武籍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域外武籍的回流,构建了东亚武籍交流的双向通道,不仅可丰富中国对域外武籍的历史认识,了解中国武术古籍东传的异域反馈,还可以潜移默化地统一东亚各国对武艺的理解与认识,为形成具有同质性的东亚武术文化创造条件。

“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武术传往海外古今有之”^[35]。书籍则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海外传播的火种。千百年来,浩如烟海的中国汉籍经由“书籍之路”络绎不绝地东传朝鲜、日本,形成独具特色的汉字文化圈。在难以计数的东传汉籍之中,亦有数量可观的武籍得以东传。特别是明清时期,由壬辰倭乱、丙子胡乱所引发的区域战争,为中国武籍东传创造条件,《纪效新书》《武备志》《练兵实纪》《三才图会》《武备要略》等绝大多数中国武术古籍都传播至朝鲜、日本。这些东传的中国武术古籍,通过原本再刊、摘抄部分内容成书、翻译、注解等形式开枝散叶,实现本土化的再创作。除此之外,朝鲜、日本还以东传的中国武术古籍为参照,新编符合自身需要的武籍。这些汲取中国武术古籍养料而再生的域外武籍,又有一部分通过“书籍之路”回流中国,形成东亚武籍交流循环往复、经久不息的崭新局面,为东亚武术文化的交融互渗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 [1] 葛兆光. 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J].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 2006(6): 275-292.
- [2] 南钟旋. 东洋武艺的美学考察[J]. 武道研究所学誌, 1992: 1-8.

- [3] 罗永一. 东洋武艺的过去、现在、未来[J]. 体育史学会誌, 1996, 2(1): 69-80.
- [4] 金一英. 东洋武艺论[M]. 首尔: 正谈传媒, 2007.
- [5] 黑木后弘. 中世以前的武道史研究私见[J]. 武道学研究, 1975, 7(2): 1-5.
- [6] 鱼住孝至. 东洋武艺的交流与开展[J]. 体育科学研究所年报, 2005(11): 1-20.
- [7] 邹振环. “华外汉籍”及其文献系统刍议[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104-114.
- [8] 王勇.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3)5: 5-12.
- [9] 马明达. 略论武术古籍与武术文献学的建立[J]. 体育文史, 1999(6): 41-43.
- [10] 余水清. 明清武术论著概述与主要成就研究[J]. 体育科学, 2004, 24(8): 75-80.
- [11] 张廷玉. 明史·外国列传·朝鲜[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307.
- [12] 朝鲜王朝实录·25册·宣祖修正实录·28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646.
- [13] 大庭修.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M]. 戚印平,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19.
- [14] 田中谦二, 松浦章. 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德泰船资4料[M]. 大阪: 关西大学出版社, 1986: 375.
- [15] 周楫. 西湖二集(卷三十四)[M]. 北京: 崇祯云林聚锦堂刊本, 1565-1566.
- [16] 缪荃孙. 日游汇编[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536.
- [17] 朝鲜王朝实录·25册·宣祖实录·182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11.
- [18] 朝鲜王朝实录·36册·显宗实录·9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428.
- [19] 朝鲜王朝实录·42册·英祖实录·47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606.
- [20] 赵凤翔, 关增建. 明末清初汉籍东传背景下的《武备志》入日考[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106, 15(11): 25-29+56.
- [21] 严绍澧.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16-817.
- [22] 朝鲜王朝实录·22册·宣祖实录·49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239.
- [23] 朝鲜王朝实录·24册·宣祖实录·124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56.
- [24] 绵谷雪. 图说古武道史[M]. 首尔: 青蛙房, 1967: 47-57.
- [25] 韩峤. 武艺诸谱·武艺交战法[M]. 首尔: 东洋语学院, 1982: 120-121.
- [26] 张伯伟.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 第6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3000.
- [27] 李德懋, 朴齐家. 武艺图谱通志: 卷1[M]. 首尔: 韩国体育史研究会, 2002: 4-6.
- [28] 朴贵顺. 16世纪以降中、日、韩的武艺身体观比较研究——以明朝、江户、朝鲜时期的武艺书为中心[D].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 2010.
- [29] 茅元仪. 武备志·阵练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3205.
- [30] 承政院日记·卷233[M]. 首尔: 民族文化促进会, 2007: 68.
- [31] 黄建国. 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M]. 北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8: 235.
- [32] 唐豪. 行健斋随笔[M]. 上海: 中国武术学会, 1937: 63-64.
- [33] 丁仁. 八千卷楼书目[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9.
- [34] 章炳麟. 尙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179.
- [35] 李信厚. 中华武术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省思[J]. 体育学刊, 2022, 29(2): 26-31.